

# 東漢的“東宮”和“西宮”

□ □ □

內容提要：東漢有南宮和北宮，其中又各有“東宮”和“西宮”，構成四個相對獨立的建築群。南宮之“東宮”以雲臺殿為前殿，其後有玉堂殿等建築。北宮之“東宮”以德陽殿為前殿，其後有章德殿等建築。南宮之“西宮”以嘉德殿為前殿，北宮之“西宮”以崇德殿為前殿，其後也各有一組建築。東漢一朝，皇帝例居“東宮”，皇太后皆居“西宮”。皇帝親政和太后臨朝兩種狀態的轉換表現為最高權力在“東宮”和“西宮”之間的切換。這一格局為少帝在位時太后臨朝提供了方便，對外戚干政局面的形成和宦官勢力的發展也有一定影響。

關鍵字：東漢 南宮 北宮 東宮 西宮

學人皆知東漢有南、北宮，但很少有人留意南、北宮中還各有“東、西宮”。《後漢書》卷八《靈帝紀》：“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sup>①</sup>卷六九《何進傳》：“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sup>②</sup>文中提到的“東、西宮”顯然在南宮中。同書卷二《明帝紀》：“帝崩於東宮前殿。”<sup>③</sup>卷七九下《儒林·楊仁傳》：“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sup>④</sup>北宮衛士令所守當然是北宮。外戚馬氏爭入北宮，是因為明帝靈柩在其中。可見《明帝紀》所謂“東宮”在北宮中。北宮中的“西宮”不見記載，但“東”與“西”對稱，既有“東宮”，應當也有“西宮”。此事對東漢宮禁制度和宮廷政治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今試考證如下。

## 一、北宮的“東宮”和“西宮”

中國古代通常稱太子宮為“東宮”，東漢亦然。如《後漢書》卷二九《申屠剛傳》：“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卷三二《陰識傳》：“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sup>⑤</sup>此類語境下的“東宮”皆指太子宮。但明帝即位後不可能仍居太子宮，更不會崩於太子宮，故上引《明帝紀》所言之“東宮”肯定不是太子宮。

古人有國君及夫人當“薨于路寢”之說。《禮記·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鄭玄注：“言死者必皆于正處也。”<sup>⑥</sup>《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經：“公薨于路寢。”杜預注：“路寢，正寢也。”孔穎達疏：“薨于路寢，得其正也。”僖公三十三年傳：“公……薨於

<sup>①</sup>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58。

<sup>②</sup> 《後漢書》，頁2252。

<sup>③</sup> 《後漢書》，頁123。

<sup>④</sup> 《後漢書》，頁2574。

<sup>⑤</sup> 《後漢書》，頁1017、1130。

<sup>⑥</sup>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第5冊，頁761上欄、下欄。

小寢，即安也。”杜預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於路寢。”<sup>①</sup>漢人則視“前殿”為路寢。《漢書》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載：有男子王褒“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下文則稱其“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sup>②</sup>西漢皇帝自惠帝以下皆居未央宮，除武帝外也都“崩於未央宮”。<sup>③</sup>武帝雖“崩於五柞宮”，但“入殯於未央宮前殿”。<sup>④</sup>昭帝的靈柩也停在前殿，故稱“大行在前殿”。<sup>⑤</sup>其他皇帝死後靈柩停於何處，不見記載，以武帝、昭帝之例推之，應當都在未央前殿。看來西漢是遵行“薨于路寢”之制的。東漢亦受此說影響，皇帝皆崩于“前殿”。《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建武十四年正月，“起南宮前殿”；中元二年二月，“帝崩於南宮前殿”。<sup>⑥</sup>明帝即位後，移居北宮，當薨於北宮前殿。《後漢書》卷四一《鍾離意傳》載：明帝“大起北宮”，尚書鍾離意加以諫阻，“及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sup>⑦</sup>《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蔡質《漢儀》載東漢歲首朝賀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sup>⑧</sup>根據這些記載，德陽殿無疑是明帝新建的北宮前殿。因此，明帝臨終所居之“東宮前殿”應該就是德陽殿。

德陽殿是北宮前殿，為何又稱“東宮前殿”？這個問題可從張衡《東京賦》及薛綜注中索解。《東京賦》述明帝營建北宮之事曰：

逮至顯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啟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于金商。飛雲龍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

這段文字大致勾畫出北宮核心區域的建築佈局。其中崇德、德陽都是殿名。“既新崇德，遂作德陽”兩句，特別是“新”、“作”二字，透露出這樣的信息：崇德殿是原有的，德陽殿是新建的；明帝先對崇德殿加以翻新或改建，故曰“既新”，然後興建德陽殿，故曰“遂作”。薛綜注逐句釋曰：

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

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

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為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為金，主義，音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於西。

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為木獸。春路，東方道也。”

象魏，闕也，一名觀也。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sup>⑨</sup>

<sup>①</sup> 《十三經注疏》，第6冊，頁180下欄a面、頁291下欄。

<sup>②</sup>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475。

<sup>③</sup> 見《漢書》，頁92、131、153、232、274、298、330、344、360。

<sup>④</sup> 《漢書》卷六《武帝紀》，頁211、212。

<sup>⑤</sup>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頁2940。

<sup>⑥</sup> 《後漢書》，頁63、85。

<sup>⑦</sup> 《後漢書》，頁1410。

<sup>⑧</sup> 《後漢書》，頁3131。

<sup>⑨</sup>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57上欄。

薛綜，三國時人，仕於孫權，去漢未遠，著有《二京解》，<sup>①</sup>對東漢宮城制度應相當瞭解。故上引注文可信度很高，唯“崇德在東，德陽在西”一句有誤。日本學者外村中已發現此事，指出崇賢門是東門，德陽殿在其內，金商門是西門，崇德殿在其內，因而“崇德殿不在東，而在西”。<sup>②</sup>其說是。案《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下》：“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同書卷五四《楊震傳附楊賜傳》載此事作：“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sup>③</sup>此證金商門是崇德殿前之門，負責崇德殿事務的崇德署在此門內。同書卷六《順帝紀》“德陽殿西鐘下”句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崇賢門內德陽殿。”<sup>④</sup>《漢官儀》乃東漢應劭所作，可信度也很高。<sup>⑤</sup>因此，崇賢門可以確定是德陽殿前之門。上引薛綜注明言崇賢門是東門，金商門是西門，且以“東方為木，主仁，如春”，“西為金，主義，音為商，若秋”等說辭進行論證，因而不會有誤。既然如此，金商門內的崇德殿必然在西，崇賢門內的德陽殿必然在東。“崇德在東，德陽在西”應作“德陽在東，崇德在西”，可能是後人傳抄致誤。

糾正了這一訛誤，《東京賦》和薛綜注所提供的信息就大致清楚了。德陽殿和崇德殿東西並列，相距五十步。<sup>⑥</sup>兩殿前的崇賢門和金商門亦東西並列。兩門之外有寬闊的庭院和三座門，南有端門，東有雲龍門，西有神虎門。端門之外則是雙闕高聳的北宮南闕門。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端門即正門，應正對前殿，但北宮端門並不正對德陽殿。《後漢書》卷四〇下《班彪傳附班固傳下》：“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李賢注引戴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sup>⑦</sup>戴延之是東晉末年人，著有《西征記》，李賢數引之。此注所引《記》，當亦《西征記》。《新唐書·藝文志》還著錄有“戴延之《洛陽記》一卷”，<sup>⑧</sup>姚振宗推測其內容亦在《西征記》中。<sup>⑨</sup>根據這條材料，崇賢門和其內的德陽殿不在端門正北，而在“端門東”，端門正對的可能是金商門和崇德殿。這一格局大概是明帝“大起北宮”時形成的。崇德殿是原有的，在明帝新建德陽殿前，它應是北宮前殿。金商門和端門也是原有的，故與崇德殿南北相對，在一條中軸線上。崇賢門和德陽殿是明帝在金商門和崇德殿以東新建的，故斜對端門。<sup>⑩</sup>秦漢殿式建築通常有內外兩個庭院，<sup>11</sup>而德陽殿和崇德殿共同擁有一個由端門、雲龍門、神虎門構成的外院，又各自擁有一個由崇賢門和金商門構成的內院。（參圖一）《明帝紀》所謂“東宮”既指德陽殿所在的東院，崇德殿所在的西院應當就是“西宮”了。

① 《三國志》卷五三《吳書·薛綜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1254。

② 外村中：《魏晉洛陽都城制度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學報》，第99號，頁7。

③ 《後漢書》，頁1998、1779。

④ 《後漢書》，頁250。

⑤ 《後漢書》卷四八《應奉傳附應劭傳》：“著《漢官禮儀故事》。”（頁1614）當即此書。參周天遊：《漢官六種·校點說明》（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

⑥ 漢代六尺為一步，一尺約合今23.1釐米，五十步約為69.3米。

⑦ 《後漢書》，頁1367。

⑧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503。

⑨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4冊，頁351。

⑩ 邏輯上不能排除明帝將端門稍稍東移使之位於金商門和崇賢門之間的可能，但現有史料中未見金商門在端門西的記載。明帝“大起北宮”致使“人失農時”，曾遭鍾離意等大臣反對。為節省人力、物力，保留原有端門和南闕門的可能性較大。南宮端門正對原有之嘉德殿（詳下），亦可作為旁證。

11 參拙文：《秦漢殿式建築的佈局》，《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3期，頁64。

## 二、南宮的“東宮”和“西宮”

前引《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提到南宮的“東、西宮”，細讀上下文，便可大致判斷其位置。為分析方便，先摘錄有關文字於下：

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闖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闔……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sup>①</sup>

此事發生於南宮嘉德殿。張衡《東京賦》：“九龍之內，寔曰嘉德。”<sup>②</sup>是嘉德殿前有九龍門。在上引文中，此門又稱“省闔”，門內即是“省中”。宦官將何進騙入九龍門殺死，並關閉“宮閣”，持兵固守。袁術等攻之不克，遂火燒“九龍門及東、西宮”。由此看來，南宮的“東、西宮”就在九龍門一線。

和北宮的金商門、崇賢門相似，南宮的九龍門也在端門、白虎等門內。《北堂書鈔》卷一〇八“靈帝鑄千斛”條引《東觀漢記》之文，提到靈帝鑄黃鍾一事。<sup>③</sup>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將其點作：“靈帝鑄黃鍾二千斛，四懸於嘉德端門內，二在雲臺殿前也。”<sup>④</sup>此事又見於《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和卷七八《宦者傳》，前者作“鑄……黃鍾四”，後者作“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sup>⑤</sup>《藝文類聚》卷八四《寶玉部下》“銅”字條引華嶠《漢書》亦有此文，作“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前”，<sup>⑥</sup>與《宦者傳》略同，唯“於”後脫“玉”字。吳樹平指出：“諸書所載皆云鑄四鍾，據《書鈔》所引則鑄六鍾，恐有訛誤。”<sup>⑦</sup>筆者以為應是《書鈔》所引有誤。<sup>⑧</sup>《東觀漢記》原文“四”應上屬，作“鑄黃鍾二千斛四”，其下應有“二在玉堂殿前”一句。可能是手民將上文或下文中“懸於嘉德端門內”一句誤抄於此。雖系誤抄，卻保留了重要信息，因為這是現今所見涉及南宮端門的惟一記載。所謂“嘉德端門”，意味著南宮端門在嘉德殿前。參照前述北宮崇德殿之例，嘉德殿、九龍門、端門應南北相對，在一條中軸線上。嘉德殿建於何時，不見記載，很可能和北宮崇德殿一樣，也是南宮原有的建築。在劉秀“起南宮前殿”之前，它應是南宮前殿。《靈帝紀》又載：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續漢書·五行志二》載此事曰：“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成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檟題數百，同時並然，若就縣華鐙，其日燒盡，延

<sup>①</sup> 《後漢書》，頁 2251、2252。

<sup>②</sup>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 57 下欄。

<sup>③</sup> 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212 冊，頁 500 下欄。

<sup>④</sup> 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36。

<sup>⑤</sup> 《後漢書》，頁 353、2537。

<sup>⑥</sup> 《藝文類聚》，汪紹楹校（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443。

<sup>⑦</sup> 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頁 140。

<sup>⑧</sup> 陳禹謨本作：“靈帝鑄黃鍾二千斛於嘉德端門內。”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889 冊，頁 531 上欄。孔本案語：“陳本刪‘四’字及‘二在’以下。”陳本雖是最早的刻本，但臆增、臆刪、臆改之處甚多，此亦一例。參閱王鏗：《山簡鄉品考——以〈北堂書鈔〉版本異文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及白虎、威興門。”<sup>①</sup>這場大火從雲臺殿燃起，向北延及樂成門、北闕，又“度道西”，延及嘉德、和歡等殿及白虎、威興等門。由此可知，雲臺殿在嘉德殿東，其間有“道”相隔。“白虎門”僅此一見，應是嘉德殿前西面的門。與白虎門對稱的是青龍門或蒼龍門，雖不見記載，但應該是存在的。<sup>②</sup>這樣看來，南宮端門、白虎門、青（蒼）龍門之內，也有東西並列的兩大建築，西為嘉德殿，東為雲臺殿。嘉德殿前有九龍門，雲臺殿前肯定也有一門，從而構成兩個院落。（參圖二）袁術所燒“東、西宮”應該就是這兩個院落。

說到這兒，就要討論一下雲臺殿和劉秀所建“南宮前殿”的關係了。南宮“前殿”在《後漢書》中僅三見，<sup>③</sup>且都在光武時期，其後便不見蹤影。這不合情理。如前述，明帝所建北宮“前殿”又名“德陽”。循例而推，劉秀所建南宮“前殿”應當也有一個名稱。張衡《東京賦》描述南宮有“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歡安福”<sup>④</sup>一句。“和歡安福”無疑是兩個殿名，中間應斷開。“前殿雲臺”則有可能是一個殿名，意味著“前殿”名“雲臺”。張銑注此句曰：“三者皆殿名。”<sup>⑤</sup>似乎是以“和歡”、“安福”為兩殿，而以“前殿雲臺”為一殿。李尤《東觀漢記》：“東觀之藝，孳孳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前望雲臺，後匝德陽。”<sup>⑥</sup>東觀位於南宮北部，是座多層閣式建築，站在上面可俯瞰洛陽全城及南北兩宮。李尤曾被和帝“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sup>⑦</sup>所言當即所見。由“前望雲臺，後匝德陽”一句可知，雲臺殿和德陽殿分別是南北兩宮最高大的建築。而秦漢皇宮中最高大的建築通常都是“前殿”，阿房宮、未央宮、建章宮、甘泉宮皆然。<sup>⑧</sup>《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蔡質《漢儀》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sup>⑨</sup>可見，德陽殿作為北宮前殿也是宮中最高大的建築。李尤將雲臺與德陽並提，證明雲臺殿是南宮最高大的建築，與“南宮前殿”的地位相符。《後漢書》卷六《順帝紀》載順帝即位事曰：順帝“於德陽殿西鐘下”即位，既而率“近臣尚書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下令收捕外戚閻氏。<sup>⑩</sup>這表明雲臺殿是南宮最重要的政治設施，也符合“前殿”身份。《後漢書》卷三二《陰興傳》：“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李賢引《尚書》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sup>11</sup>此事虛驚一場，劉秀不久便“疾瘳”了，但他病重時以為不久于人世，故移居“雲臺廣室”，並委任了顧命大臣。從其後劉秀“崩於南宮前殿”的事實看，“雲臺”應當就是

① 《後漢書》，頁 351、3297。

② 《續漢書·百官志二》宮掖門條：“南宮……蒼龍司馬，主東門。”劉昭注：“案《洛陽宮門名》為蒼龍闕門。”（《後漢書》，頁 3580）此為“宮門”，而與白虎門相對的青龍門或蒼龍門是“殿門”，二者不同。參拙文《東漢的“殿中”和“禁中”》，《中華文史論叢》2018 年第 1 期。

③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中元二年二月，“帝崩於南宮前殿”。同書卷四二《廣陵王荆傳》：“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頁 63、85、1446）

④ “雲臺”，李善注本作“靈臺”。靈臺位於洛陽城南郊，不在南宮中，應以“雲臺”為是。李善注本蓋因雲、靈型近至訛。類似情形常見。如上引《續漢書·五行志二》“南宮雲臺災”，《太平御覽》卷八三五引作“南宮靈臺災”。（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3729 下欄）《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周黨傳》：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頁 2762）《太平御覽》卷四九八引《東觀漢記》載此事作“臣願與並論靈臺之下”。（頁 2276 上欄）

⑤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 57 下欄。

⑥ 《藝文類聚》卷六三《居處部三》，頁 1135。

⑦ 《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李尤傳》，頁 2616。

⑧ 參拙文：《未央宮四殿考》，《歷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⑨ 《後漢書》，頁 3131。“五”字疑衍。

⑩ 《後漢書》，頁 249、250。

11 《後漢書》，頁 1131。

“南宮前殿”。

據《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劉秀“起南宮前殿”在建武十四年。而同書卷三三《馮魴傳》：“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李賢注：“即南宮雲臺也。”卷三六《范升傳》：“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卷七七《酷吏樊曄傳》：“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sup>①</sup>可見“雲臺”在劉秀“起南宮前殿”之前已經存在，而且是劉秀經常使用的重要政治設施。看來，劉秀是將原有的“雲臺”改建為“南宮前殿”，並保留了原來的名稱。

西漢殿式建築似流行一正殿在前、二配殿在後的格局，<sup>②</sup>但未見稱之為前、後殿的例子，故未央、長樂等宮的“前殿”都是專有名稱。東漢則不同，常見“某某前殿”、“某某後殿”之稱。如“崇德前殿”、“崇德後殿”，“玉堂前殿”、“玉堂後殿”，又有“德陽前殿”、“章德前殿”等，當亦有同名後殿。在這種情況下，“前殿”已非專有名稱，若不系殿名便亦致混淆。南北兩宮的“前殿”往往直稱雲臺殿和德陽殿，當與此有關。

### 三、北宮章德殿和南宮玉堂殿

南、北宮中各有東、西宮，形成四個相對獨立的院落。崇德、德陽、嘉德、雲臺四殿是各院落的標誌性建築，其後還有其他建築，構成四個宮殿群。德陽殿被稱作“東宮前殿”，便透露出“東宮”有許多殿，而德陽是其中的“前殿”。

《後漢書》卷三七《桓榮傳附桓郁傳》：明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李賢注：“宣明殿在德陽殿后。”卷一〇《皇后紀下》：順帝“于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李賢注：“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sup>③</sup>東漢史籍中未見“德陽宮”之稱，但壽安、宣明等殿亦屬德陽殿所在之“東宮”是不錯的。崇德殿、嘉德殿、雲臺殿所在的院落當亦如是。由於洛陽以前不是帝都，以原有建築為主的“西宮”不如東漢新建的“東宮”來的宏偉，故東漢皇帝皆居“東宮”。

《蔡邕集》載前述奉詔入崇德殿之事曰：邕等“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為都座”，曹節、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sup>④</sup>曹節和王甫都是靈帝身邊的宦官，奉靈帝之命而來，故曰“從東省出”。“東省”即皇帝之省，在“東宮”。<sup>⑤</sup>

北宮之“東宮”，除德陽殿外，最重要的建築是章德殿。德陽殿主要用於重大禮儀活動，章德殿則是皇帝日常辦公和居住的場所。《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章帝竇皇后“入掖庭，見於北宮章德殿。”卷三《章帝紀》：“帝崩于章德前殿。”卷五五《清河王慶傳》：“永元四年，（和）帝移幸北宮章德殿。”卷四《和帝紀》：“帝崩于章德前殿。”<sup>⑥</sup>根據這些記載，章帝、和帝皆居章德殿。安帝、少帝亦居北宮，居於何殿不見記載，應當也是章德殿。除“薨于路寢”外，漢人還有路寢用於“治事”、小寢用於“燕息”之說。《周禮·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鄭玄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

<sup>①</sup> 《後漢書》，頁 1148、1228、2491。

<sup>②</sup> 參閱劉慶柱主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頁 274、286。

<sup>③</sup> 《後漢書》，頁 1254、1255、439。

<sup>④</sup> 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八《漢蔡邕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4 年），頁 441 下欄。

<sup>⑤</sup> 參拙文：《東漢的“殿中”和“禁中”》。

<sup>⑥</sup> 《後漢書》，頁 415、159、1800、194。

時燕息焉。”<sup>①</sup>章帝、和帝崩于“章德前殿”，意味著此殿便是“路寢”，即其“治事”之處，而章德後殿當屬“小寢”，即其“燕息”之處。《後漢書》卷三五《張純傳附張奮傳》：永平十七年，“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sup>②</sup>此時明帝已居北宮，故宣平殿應在北宮。明帝既在此引見臣下，當是其日常“治事”之處。宣平殿僅見於明帝時，而章德殿卻不見於明帝時。筆者由此懷疑，章德殿可能就是原來的宣平殿，章帝時改了殿名。

南宮之“東宮”，除雲臺殿外，最重要的建築是玉堂殿。前述靈帝“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便可證明這一點。《後漢書》卷六《順帝紀》：順帝、沖帝、質帝皆“崩於玉堂前殿”。<sup>③</sup>這意味著三帝皆居玉堂殿，前殿是“治事”之“路寢”，後殿是“燕息”之“小寢”。此殿自順帝以後才見於記載。《後漢書》卷六《順帝紀》：陽嘉元年，“起西苑，修飾宮殿。”<sup>④</sup>同書卷三〇《郎顛傳》載顛批評此事曰：“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sup>⑤</sup>是順帝曾繼明帝之後又一次大規模修造宮殿，玉堂殿便是成果之一。但該殿可能也有前身。《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建武年間，隗囂派馬援奉書至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注引《東觀記》曰：“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後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有詔置於宣德殿下。”<sup>⑥</sup>袁宏《後漢紀》載此事曰：馬援“初到，召詣尚書。有頃，中黃門一人引入，時在宣德殿。”<sup>⑦</sup>從這幾條材料看，宣德殿似為劉秀日常辦公的場所。但劉秀之後，不見皇帝于宣德殿辦公的記載，卻出現了地位和功能與之相似的安福殿。張衡《東京賦》描述南宮諸殿，只有“前殿雲臺，和歡、安福”和“九龍之內，寔曰嘉德”兩句，可見安福殿是南宮重要建築。而由前引《續漢志》所載雲臺之火“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可知，和歡殿在“西宮”，那麼安福殿便很有可能在“東宮”。《後漢書》卷八〇《文苑黃香傳》：“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sup>⑧</sup>和帝當時居南宮，<sup>⑨</sup>召臣下“詣安福殿言政事”，表明該殿是他日常辦公的場所。或許和帝以後的安福殿就是原來的宣德殿，順帝又將其改建為玉堂殿。

《續漢書·百官志三》：“黃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黃綬。本注曰：宦者。”<sup>⑩</sup>東漢黃門令所主之“省”是皇帝生活起居和辦公理政之所，黃門署長等應是黃門令屬官。從黃門署、畫室署、玉堂署、丙署等機構的名稱中，可大致看出該“省”的結構和佈局。玉堂署顯然是管理玉堂殿的機構，而玉堂殿無疑是“省”中主體建築。此殿也有內外兩個庭院，黃門署所掌“黃門”顯然是其外院大門，畫室署所掌“畫室”則是其內院之門。西漢未央宮也有畫室門。《漢書》卷六八《霍光傳》載：昭帝時，大將軍霍光與左將軍上官桀輔政。桀令人以燕王名義誣告霍光謀反，“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

① 《十三經注疏》，第3冊，頁91下欄。

② 《後漢書》，頁1198。

③ 《後漢書》，頁274、276、282。

④ 《後漢書》，頁262。

⑤ 《後漢書》，頁1054、1058。

⑥ 《後漢書》，頁830、840、841。

⑦ 袁宏：《後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69。

⑧ 《後漢書》，頁2614。

⑨ 參拙文：《東漢的南宮和北宮》，《文史》2018年第1輯。

⑩ 《後漢書》，頁3594。

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sup>①</sup>此事發生的場所可能是西漢皇帝日常辦公的承明殿，<sup>②</sup>“畫室”則是殿前內院之門。<sup>③</sup>霍光作為輔政大臣入殿見昭帝，本應直入此門而上殿，“止畫室中不入”是因自己被彈劾，故以待罪姿態等候皇帝召見。東漢玉堂殿前的“畫室”門，應是沿用西漢之名。據上引《續漢志》，“畫室署長”在“黃門署長”和“玉堂署長”之間。這也意味著畫室門在黃門和玉堂殿之間，與殿前內院之門的位置相符。所謂“丙署”應是管理“丙舍”的機構。《後漢書》卷五五《清河王慶傳》：章帝廢太子慶，將其母梁貴人“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和帝即位後，慶亦曾“別居丙舍”。<sup>④</sup>丙署長既有七人，丙舍當有七處。丙署既歸黃門令掌管，丙舍的功能當與玉堂後殿相似，也是皇帝“小寢”。七處“丙舍”可能還各有殿名。同書卷六《順帝紀》：永和元年十月，“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sup>⑤</sup>卷六一《周舉傳》：“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永和六年，“時連有災異，帝……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sup>⑥</sup>承福殿當在玉堂殿附近，故永和年間順帝因“承福殿火”一度“避御雲臺”，又移居顯親殿若干年。承福、顯親等殿可能都是“丙舍”。

玉堂殿是順帝以後才有的，《續漢志》黃門令條所載當然是順帝以後南宮的制度。四庫全書本《東觀漢記》卷四《百官表》四庫館臣校語曰：“司馬彪之《志》本之胡廣所注王隆《漢官篇》，多順帝以後所更改。”<sup>⑦</sup>其說是。但這條材料所反映的基本制度，應是南北兩宮通用的。所以，當皇帝居北宮時，黃門令所掌管的應是以章德殿為中心的一個建築群。張衡《東京賦》描述崇德、德陽以北的建築說：“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sup>⑧</sup>此八殿有“飛閣”相連，顯然是一組建築。張衡《東京賦》作于安帝時，故對宮中建築的描述以北宮為主。奇怪的是，章德殿此時已存在，張衡卻未提及。八殿中除章臺、宣明、壽安外皆不見於史傳，<sup>⑨</sup>這本不足為怪，但“含德”居八殿之首，應是重要建築，也不見於史傳便不合情理。因此，筆者懷疑“含德”或為“章德”之誤。在北宮由黃門令掌管的“省中”，章德殿是主體建築，此外還應有相當於南宮“丙舍”的建築。《東京賦》提到的“章臺”以下七殿有可能就是北宮的“丙舍”。

<sup>①</sup> 《漢書》，頁 2935、2936。

<sup>②</sup> 參拙文：《未央宮四殿考》。

<sup>③</sup> 注家對“畫室”有各種解釋。如純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王先謙《補注》引何焯曰：“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成（原文誤作武）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又引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祿勳禁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又引周壽昌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殿也。”王先謙以為“周說是”。（《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03下欄、1304上欄）周說的根據主要是《漢書》卷六六《楊敞傳附楊惲傳》中的一段文字：“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討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聞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頁2891）此“西閣”在宮中何處，無從考證。周說在“殿前”，並無證據。《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頁4159）是未央宮中的牆垣有建成閣道形式者。楊惲“上觀西閣”，又云“天子過此”，則“西閣”應是宮中某處西垣上的閣道，道側壁上畫有歷史人物，與霍光所止“畫室”無關。筆者以為，從上下文看，“畫室”即非閣道，亦非殿前一室，而是殿前之門。

<sup>④</sup> 《後漢書》，頁1800。

<sup>⑤</sup> 《後漢書》，頁265。

<sup>⑥</sup> 《後漢書》，頁2027、2029。

<sup>⑦</sup>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0冊，頁93上欄。

<sup>⑧</sup>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頁57上欄、下欄。

<sup>⑨</sup> 《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附馬防傳》：“子鉅……當冠，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台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卷三二《樊儵傳》：“廣陵王荊有罪……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續漢書·五行志二》劉昭注引《古今注》：“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頁856、1123、3293）



章德殿可能還與著名的“鴻都門”有關。《後漢書》卷三六《賈逵傳》：章帝“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sup>①</sup>章帝在章德前殿理事，此黃門署所掌“黃門”就是殿前外院之門。賈逵所選弟子及門生在此受業，如同天子門生，故令人羨慕。靈帝也有類似舉動。同書卷八《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卷六〇下《蔡邕傳》詳載其事曰：“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sup>②</sup>靈帝顯然在鴻都門內理事，鴻都門學生“待制鴻都門下”，故得以用“方俗閭里小事”哄靈帝開心。同書卷一五《來歷傳》：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歷要結大臣十余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群臣”，群臣“乃各稍自引起”。<sup>③</sup>此例證明，鴻都門是安帝日常“治事”之“路寢”外大門，很可能就是章德殿前外院之“黃門”。

東漢皇帝只有靈帝曾居“西宮”。《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蔡質所記靈帝立宋皇后儀曰：“皇后初即位于章德殿”。<sup>④</sup>靈帝立宋皇后的儀式在章德殿舉行，證明靈帝即位後居北宮章德殿。約在中平元年四月至二年二月間，靈帝“徙南宮”，<sup>⑤</sup>六年四月“崩於南宮嘉德殿”。<sup>⑥</sup>靈帝徙南宮，照例應居玉堂殿，居嘉德殿當有特殊原因。案《後漢書》卷八《靈帝紀》，前述“南宮大災”發生在中平二年二月己酉，應在靈帝“徙南宮”後不久。大火燒了“東宮”的雲臺、玉堂等殿，也延及“西宮”的嘉德和歡等殿。於是宦官“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又營私舞弊，從中漁利，致使“宮室連年不成”。<sup>⑦</sup>在這場火災中，“東宮”建築確實損毀嚴重，故有“復修玉堂殿”及鑄四黃鍾“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之事；“西宮”建築未見大規模修復，可能損失不大。靈帝遂暫時移居嘉德殿，四年後因“東宮”修復工程拖延，未及遷回便死在了嘉德殿。

#### 四、太后與“西宮”

東漢之制，皇帝死後，新帝即位，先帝的后妃都要遷出中宮和掖庭。其中，貴人以下須移居別宮或帝陵，只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從“中宮”遷入“長樂宮”，<sup>⑧</sup>繼續與皇帝同居一宮。東漢初的陰氏、馬氏兩位皇太后都是這樣。劉秀居南宮，陰氏作為皇后當然居南宮之“中宮”。明帝即位之初仍居南宮，永平八年移居北宮。陰氏為皇太后，永平七年崩，沒趕上搬家，始終居於南宮。《後漢書》卷四二《東平王蒼傳》載：章帝“饗衛士于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sup>⑨</sup>東漢“饗遣故衛士”的儀式例於前殿舉行。

<sup>①</sup> 《後漢書》，頁 1239。

<sup>②</sup> 《後漢書》，頁 340、1991、1992。

<sup>③</sup> 《後漢書》，頁 591。

<sup>④</sup> 《後漢書》，頁 3122。

<sup>⑤</sup> 文見《後漢書》卷五四《楊賜傳》，頁 1784。詳細考證見拙文：《東漢的南宮和北宮》，《文史》2018 年第 1 輯。

<sup>⑥</sup> 《後漢書》卷八《靈帝紀》，頁 357。

<sup>⑦</sup>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張讓傳》，頁 2535。

<sup>⑧</sup> 后妃所居後宮在皇帝寢殿之後。其中皇后之宮稱“中宮”，當是相對於其他嬪妃所居之東、西掖庭而言，與本文所論東、西宮無關。

<sup>⑨</sup> 《後漢書》，頁 1438。

①章帝在南宮前殿完成儀式後，隨馬太后至掖庭周行懷舊，既而又至陰太后故居閱其“舊時器服”。明帝居南宮時，馬氏為皇后居“中宮”，陰氏為太后居“長樂宮”。明帝移居北宮後，陰太后在南宮的故居長期空置，保留著“舊時器服”。明帝居北宮時，馬皇后當然居北宮之“中宮”。明帝崩，章帝即位，馬氏被尊為皇太后。《後漢書》卷一〇上《明帝馬皇后紀》載：“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明帝諸貴人都要徙居南宮，只有馬太后留居北宮，故有“析別之懷”。馬太后不曾“臨朝”，因與章帝同居北宮，故“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②

皇太后身份貴重，長樂宮又有少府、衛尉、太僕、謁者、尚書、私府令、永巷令、黃門冗從僕射等官員和機構分掌各種事務，③故需較大院落才能安置。南北兩宮之中，除皇帝所居“東宮”和皇后所居“中宮”外，大約只有“西宮”能滿足需要。史籍對東漢太后所居何殿多無明確記載，但有跡象顯示，她們的主要活動場所是北宮崇德殿和南宮嘉德殿，都在“西宮”。

證據較明顯的是鄧太后和閻太后。和帝崩後，鄧太后“臨朝”，立“誕育百餘日”的殤帝。數月後，殤帝崩，“殯於崇德前殿”。④鄧氏又立安帝。《後漢書》卷五《安帝紀》載其事曰：“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⑤章帝、和帝皆居章德殿，崩于章德前殿。殤帝即位應在章德前殿，即位後照理也應居章德殿，崩後則應殯于章德前殿。但實際上殤帝的殯禮和安帝的即位禮都在崇德前殿舉行。這應是由於鄧太后居於崇德殿所在之西宮，而殤帝即位時不滿一歲，在太后宮中撫養，故其殯禮和安帝即位禮都在崇德前殿舉行。安帝崩後，閻太后“臨朝”，立少帝。史稱“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少帝年幼，政務當然全由閻太后主持。少帝在位二百餘日而崩，宦官孫程等發動政變，立順帝，並“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順帝控制局面後，“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⑥袁宏《後漢紀》載此事作：“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獄誅。”⑦這條材料證明，閻太后亦居西宮，閻顯等人則在崇德殿協助太后處理政務。⑧

順帝崩後，皇太后梁氏“臨朝”，先後立沖帝、質帝，皆崩，又立桓帝。《後漢書》卷七《桓帝紀》：梁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順、沖、質帝皆居玉堂殿，桓帝即位之初當亦居玉堂殿，但不久便移居北宮，最終“崩於德陽前殿”。⑨其間，桓帝曾因北宮發生火災回南宮住了近兩年。《桓帝紀》載其事曰：建和二年五月，“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和平元年三月，“車駕徙幸北宮”。⑩梁太后自當隨桓帝先後居於南、北兩宮之“西宮”。上引《桓帝紀》“太后猶臨朝政”句

① 參《續漢書·禮儀志中》，見《後漢書》頁 3129。

② 《後漢書》，頁 410、413。

③ 見《續漢書·百官志四》“大長秋”條，《後漢書》，頁 3606~3608。

④ 《後漢書》，頁 195、199。

⑤ 《後漢書》，頁 203。

⑥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孫程傳》，頁 2515。

⑦ 袁宏：《後漢紀》，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337。

⑧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載此事曰：“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頁 250）文中“幸嘉德殿”一句費解。閻太后當時在北宮，順帝在南宮雲台，南宮嘉德殿不是重要政治設施，順帝派侍御史去北宮收捕閻顯等人，沒必要特意前往嘉德殿。今從《後漢紀》。

⑨ 《後漢書》，頁 287、320。

⑩ 《後漢書》，頁 292、296。

李賢注引《東觀記》曰：“太后御卻非殿。”<sup>①</sup>案《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劉秀初“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sup>②</sup>當時尚未興建“東宮”，却非殿肯定是南宮原有建築，在“西宮”的可能性較大。《後漢書》卷一〇下《順帝梁皇后紀》載其臨終之事曰：“和平元年春，歸政于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發遺詔，“後二日而崩”。<sup>③</sup>《桓帝紀》系此事于和平元年二月甲寅，在桓帝遷回北宮前。由此可知梁太后崩于南宮。但如前所考，南宮宣德殿曾是劉秀日常辦公的場所，後來改稱安福殿，又改稱玉堂殿，故桓帝時應無宣德殿。疑此處“宣德”乃“嘉德”之誤，梁太后居“西宮”，其“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在嘉德殿協助處理政務，臨終則遵“薨于路寢”之制移居嘉德前殿。

靈帝在位時，還曾建立“永樂宮”。《後漢書》卷一〇下《孝仁董皇后紀》：建寧二年三月，靈帝迎其生母至洛陽，“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宮稱永樂”，<sup>④</sup>史稱“永樂太后”。《後漢書》卷八《靈帝紀》載：光和五年五月，“永樂宮署災。”《續漢書·五行志二》載此事作：“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sup>⑤</sup>德陽殿在崇德殿東，“德陽前殿西北”就是崇德前殿之後，應是崇德後殿。是永樂太后先居南宮嘉德殿，後遷北宮崇德殿，兩殿都在“西宮”。《孝仁董皇后紀》又載：“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諤等交通州郡，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sup>⑥</sup>永樂太后之省在“西宮”中，故稱“西省”。

靈帝死後，少帝劉辯即位，年十七，已成人，應居“東宮”。皇后何氏被尊為皇太后，“臨朝”，居於“西宮”。數月後，便發生了宦官殺何進、袁術火燒東、西宮的事件。《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載：“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宦官張讓、段珪等決意除掉何進，遂“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闔……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何進奉太后之召入“省闔”至“嘉德殿前”，足證何太后居“西宮”。其後，宦官在袁術、袁紹等人的攻勢下，“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sup>⑦</sup>袁宏《後漢紀》載此事曰：宦官“持太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sup>⑧</sup>《何進傳》又載：宦官挾少帝、陳留王逃出洛陽，“奔小平津”，“投河而死”。少帝返回北宮後，董卓執政，“遂廢帝”。同書卷七二《董卓傳》載其事曰：“集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sup>⑨</sup>可見何太后入北宮後仍居“西宮”，重大活动在崇德殿舉行。

## 五、“東西宮”格局對東漢政治的影響

劉秀、明帝營建南、北宮時，保留了宮中原有的主要建築，在其東側大興土木，由此形成“東西宮”布局。皇帝皆居“東宮”，“西宮”自明帝以後便用來安置太后。這一做法與西漢不同，但也有其緣由。西漢長安有未央宮和長樂宮，皇帝居未央宮，太后居長樂宮。東漢洛陽有南北兩宮，本來也可分別用作帝宮和

<sup>①</sup> 《後漢書》，頁 287、288。

<sup>②</sup> 《後漢書》，頁 25。

<sup>③</sup> 《後漢書》，頁 440。

<sup>④</sup> 《後漢書》，頁 446。

<sup>⑤</sup> 《後漢書》，頁 347、3296。

<sup>⑥</sup> 《後漢書》，頁 447。

<sup>⑦</sup> 《後漢書》，頁 2251、2252。

<sup>⑧</sup> 袁宏：《後漢紀》，頁 496。

<sup>⑨</sup> 《後漢書》，頁 2324。

太后宮。但劉秀廢黜郭皇后而改立陰皇后時，將郭氏遷至北宮，使之成為冷宮，致有“太后失職，別守北宮”的抱怨。<sup>①</sup>南北兩宮的這種關係從此確定下來。若皇帝居北宮，南宮便是冷宮。如靈帝時竇太后原居北宮，失勢後被遷于南宮，時人謂之“幽隔空宮”。<sup>②</sup>明帝即位後，尊其母陰氏為皇太后，當由中宮遷至長樂宮。明帝對陰氏感情甚深，自然不願將其安置到冷宮，且明帝即位後不久便“大起北宮”，也不便以北宮為長樂宮。於是，南宮中空置的“西宮”便成了長樂宮。章帝即位後，繼承明帝的做法，自居“東宮”，而以“西宮”為長樂宮，安置馬太后。從此，皇帝與太后分居“東西宮”的格局確定下來，並對外戚宦官干政局面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

蔡邕《獨斷》言太后臨朝之制曰：“秦漢以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群臣，后東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sup>③</sup>在秦漢帝國體制下，皇帝是最高權力的象徵，其“治事”之處則是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太后“臨朝”、“攝政”，須親臨皇帝“治事”之處替皇帝處理政務。西漢皇帝居未央宮，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尚書、御史、朝堂等機構和設施都在未央宮。太后“臨朝”，似須移居未央宮。惠帝時呂太后居長樂宮，惠帝為“東朝長樂宮”方便，還在兩宮之間建了一條“複道”。<sup>④</sup>及“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呂氏應於此時便入居未央宮，直至八年後“崩於未央宮”。<sup>⑤</sup>昭帝崩後，霍光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後又廢賀而改立武帝曾孫病已。史載其事曰：“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主持了廢黜劉賀的儀式。<sup>⑥</sup>既而“曾孫……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十一月，“皇太后歸長樂宮”。<sup>⑦</sup>這位皇太后無“臨朝”之名，但有“臨朝”之實，故“幸未央承明殿”後便住在未央宮，事情結束後才“歸長樂宮”。平帝即位，太皇太后王氏“臨朝”。<sup>⑧</sup>《漢紀·平帝紀》元始五年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荀悅釋曰：“初，惠帝為出遊長樂宮，方築複道在高廟道上……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sup>⑨</sup>其意似指王氏從長樂宮經複道至未央宮臨朝。其間，王氏可能也居於未央宮。平帝死後，王莽居攝踐阼，“改元稱制”，王氏才回到長樂宮。<sup>⑩</sup>在皇帝、太后分居未央、長樂兩宮的情況下，權力重心始終在未央宮。太后只有“臨朝”時才入居未央宮，掌控最高權力。西漢很少出現“少帝”，故太后“臨朝”也不多見。外戚參政多以“宰相”、“輔政”、“領尚書事”等名義介入未央宮權力中心，在皇帝之下發揮作用。

東漢則不同，太后皆居“西宮”，與皇帝所居“東宮”比肩相鄰。太后“臨朝”和皇帝“親政”兩種狀態的轉換，表現為最高權力在“東宮”和“西宮”之間的切換。太后一旦“臨朝”，可利用當皇后時在宮中形成的影響力迅速控制局

① 《後漢書》卷四二《廣陵王荊傳》，頁 1446。

② 《後漢書》卷五七《謝弼傳》，頁 1859。

③ 蔡邕：《獨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0年），頁 13 上欄、下欄。

④ 《漢書》卷四三《叔孫通傳》，頁 2129。

⑤ 《漢書》卷三《高後紀》，頁 95、100。

⑥ 《漢書》卷六八《霍光傳》，頁 2938。

⑦ 《漢書》卷八《宣帝紀》，頁 238、239。

⑧ 《漢書》卷一二《平帝紀》，頁 348。

⑨ 荀悅：《漢紀》，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 527。“太后”之前有缺文，語句不完整。

⑩ 《漢書》卷九八《元后傳》載：漢有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頁 4032）又載：“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頁 4033）東宮即長樂宮。可見王太后此時居長樂宮。

面，並依靠長樂宮官屬和外戚在“西宮”處理政務。這有助於在“少帝”即位后使整個國家機器維持正常運轉，但也有嚴重的負面效應。

長樂宮門禁更為森嚴，士人出入不便，故太后理政離不開外戚和宦官。如和帝竇太后臨朝，“兄憲，弟篤、景，並顯貴，擅威權。”<sup>①</sup>鄧太后臨朝，兄弟鶯、悝、弘、閻“常居禁中”，參與政事。<sup>②</sup>閻太后臨朝，“兄弟權要，威福自由”。<sup>③</sup>梁太后臨朝，兄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sup>④</sup>靈帝竇太后臨朝，父武“常居禁中”，“輔朝政”。<sup>⑤</sup>宦官的職責“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但自安帝以後卻“猥受過寵，執政操權”。<sup>⑥</sup>大臣朱穆釋其緣由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sup>⑦</sup>太后並非絕對“不接公卿”，但主要依靠宦官處理政務和傳遞信息確是事實。外戚、宦官不是東漢正規官僚體制內的成員，未經察舉、征辟、考課等程式的篩選。其中部分人缺乏道德和政治素養，濫用權力，干預選舉，搜刮財富，胡作非為，對東漢政治和社會造成破壞。此其一。

太后和外戚、宦官在“西宮”理政，會迅速形成強大的宮中勢力。這種勢力不僅控制著長樂宮，還會滲透、影響宮中各個角落，包括“東宮”的官員和宦者，從而使皇帝處於被看管甚至被軟禁的境地。《後漢書》卷七八《宦者鄭眾傳》載：竇憲當政時，“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sup>⑧</sup>此文語氣不免誇張，但朝中官員包括和帝身邊的宦者大多依附竇氏則是事實。同書卷三四《梁統傳附梁冀傳》載：梁冀當政時，“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質帝“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將質帝毒死。<sup>⑨</sup>可見連質帝身邊的人都唯梁冀之命是從。難怪和帝對竇氏下手前先從南宮“幸北宮章德殿”，順帝對閻氏下手前先從北宮“到南宮，登雲臺”，都是為了跳出外戚的控制範圍。太后“臨朝”不可能持久，“少帝”成年便應親政。但當權的外戚總想“久專國政”，不肯主動退出，致使最高權力每次從“西宮”回歸“東宮”，都會發生流血政變，都會使一個外戚家族及眾多依附於該家族的宦官、大臣、親信、賓客等受到誅殺、流放、禁錮，從而使東漢統治集團一再從內部遭到削弱。此其二。

“少帝”在外戚的控制下，“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sup>⑩</sup>要從外戚手中奪回權力，也得依靠宦官。這為宦官勢力的膨脹提供了更重要的推力。宦官鄭眾參與了和帝推翻竇氏的政變，因此得到和帝信任，“常與議事”，史稱“中官用權，自眾始焉”。<sup>11</sup>順帝被廢為濟陰王後，幾無還手之力，全靠孫程等十九名宦官發動政變才得以即位。事後順帝封程等為列侯，使宦官向宮中政治勢力的演變又進了一大步。桓帝誅梁冀時已即位十二年，梁太后早就死了，但他仍小心謹慎。史稱：“帝逼畏久，恒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後“因如廁”，獨與宦官唐衡商議，又吸收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並“齒超臂出血為

① 《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頁 416。

② 《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附鄧鶯傳》，頁 613。

③ 《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上》，頁 437。

④ 《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梁冀傳》，頁 1183。

⑤ 《後漢書》卷六九《竇武傳》，頁 2241。

⑥ 《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附楊秉傳》，頁 1774。

⑦ 《後漢書》卷四三《朱暉傳附朱穆傳》，頁 1472。

⑧ 《後漢書》，頁 2512。

⑨ 《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梁冀傳》，頁 1183、1179。

⑩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傳序》，頁 2509。

11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鄭眾傳》，頁 2512。

盟”。事後五人皆封列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sup>①</sup>自梁氏覆滅後，宦官的勢力已強大到足以掌控桓、靈兩代成年皇帝，也足以壓制竇氏、何氏兩家外戚，遂使東漢政治進入最黑暗時期。此其三。

東漢外戚、宦官干政局面的形成有著複雜的原因，“東西宮”格局的存在是其中之一。何進被殺後，外戚和宦官同歸於盡，董卓又放火燒了洛陽城，南北兩宮皆毀。曹魏建立後，在東漢北宮舊址上重建洛陽宮。《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青龍三年條：“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sup>②</sup>同書卷二《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案：“明帝時，始於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sup>③</sup>曹植《毀鄆城故殿令》稱：“大魏龍興……平德陽而建泰極。”<sup>④</sup>綜合這些記載可知，曹魏“平”了德陽殿，在崇德殿故處興建太極殿和昭陽殿，東、西宮並立的格局被徹底改變。曹魏吸取東漢的教訓，對外戚、宦官控制極嚴，對宮室格局的改造或許也與此有關。

引用書目：

-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荀悅：《漢紀》，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袁宏：《後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漢蔡邕集》，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蔡邕：《獨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羅國威整理：《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北堂書鈔》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本，《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藝文類聚》，汪紹楹校，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  
周天遊：《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陳蘇鎮：《秦漢殿式建築的佈局》，《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3期。  
陳蘇鎮：《未央宮四殿考》，《歷史研究》2016年第5期。  
陳蘇鎮：《東漢的“殿中”和“禁中”》，《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第1期。

<sup>①</sup> 《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單超傳》，頁2520。

<sup>②</sup> 《三國志》，頁104。

<sup>③</sup> 《三國志》，頁76。

<sup>④</sup> 羅國威整理：《文館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425。曹植于黃初二年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此令主旨是要拆掉鄆城內一座漢武帝時所建舊殿，應是曹植為鄆城侯和鄆城王期間所作。曹植死於太和六年，比明帝“大治洛陽宮”早三四年。安田二郎據此認為，“黃初三、四年間，在後漢洛陽宮城的北宮基礎上建設曹魏宮城的全部計畫，包括建立宮殿、門闕的名稱和配置等內容的基本藍圖可能已經決定了。”其說可參。見氏撰：《曹魏明帝的“宮室修治”をめぐって》，《東方學》，第111輯，2006年，頁7。

陳蘇鎮：《東漢的南宮和北宮》，《文史》2018年第1輯。  
王鏗：《山簡鄉品考——以〈北堂書鈔〉版本異文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劉慶柱主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外村中：《魏晉洛陽都城制度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學報》，第99號。  
安田二郎：《曹魏明帝の“宮室修治”をめぐる》，《東方學》，第111輯，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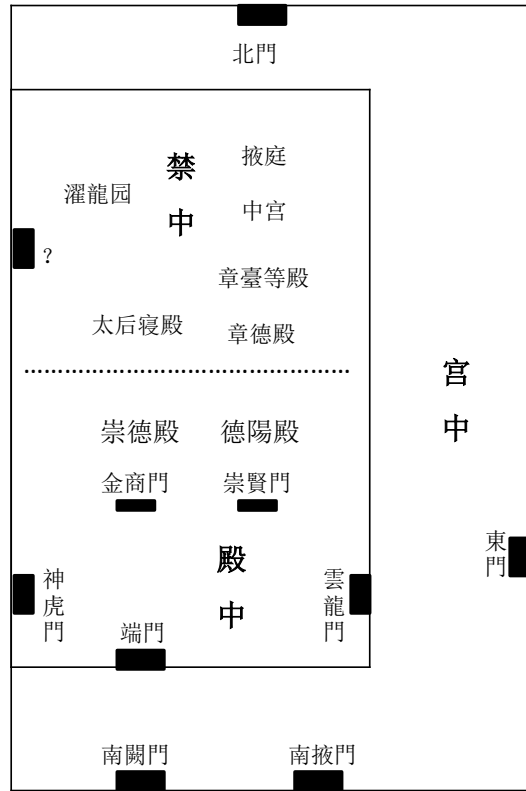
### 東漢的“東宮”和“西宮”

#### The East-West Divid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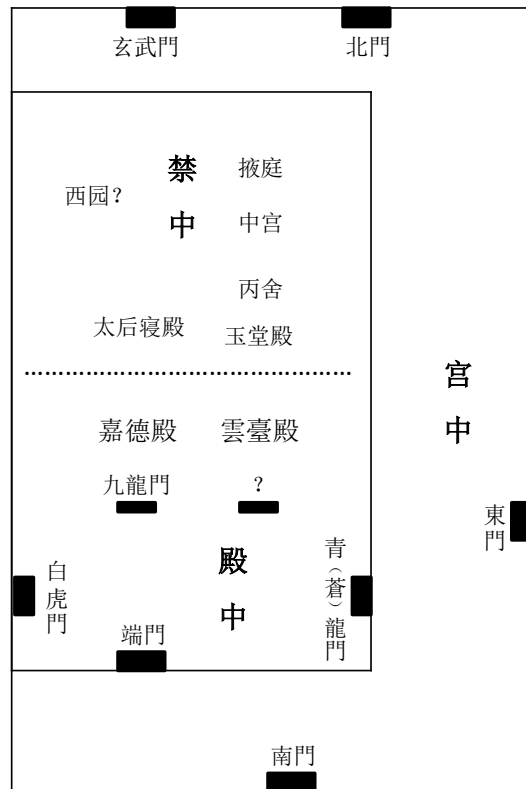
The imperial palace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consisted of the Southern Palace and the Northern Palace, and therefore, the imperial palace was constituted by four rather independent building complexes. The front hall of the south-east palace complex was the *Yuntai Hall*, and to the north of it there were the *Yutang Hall* and other buildings. The front hall of the northeast palace complex was the *Deyang Hall*, and behind it there were the *Zhangde Hall* and other buildings. The front hall of the southwest and the northwest palace complex were the *Jiade Hall* and the *Chongde Hall* respectively, and each had its own affiliated buildings. In the later Han dynasty, the Eastern Palace was the residence of the emperor, while the Western Palace was that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he shifts between the actual reign of emperors and the regency periods of empress dowagers were manifested in the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lace. **The east-west divide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powerful empress dowagers to hold the regency in her own residence**, which also led to the consort kins' involvement in court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eunuchs.

關鍵字：東漢 南宮 北宮 東宮 西宮

Keywords: the Later Han, the Southern Palace, the Northern Palace, the Eastern Palace, the Western Palace



圖一 北宮示意圖



圖二 南宮示意圖



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本第 3 分